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官方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 <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www.sciencenet.cn](http://www.sciencenet.cn)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 3000 万人,失眠等心理疾病患者超过 5000 万人。然而,与国外的叶茂枝繁相比,中国的临床心理学才刚刚起步——

# 心理疾患:痛在“心”口难开

■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英国《卫报》日前报道称,中国人开始接受心理疗法。不过,文章也指出,虽然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心理咨询师已有 40 万人,但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获得从业执照太容易了。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 3000 万人,失眠等心理疾病患者超过 5000 万人。与此同时,从汶川地震到鲁甸地震,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也使得心理问题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心理服务。然而,找到一个靠谱的、可以提供服务的人或机构,却成为求助者最大的困扰。就诊率高、辨识率低、治愈率低,成为我国心理服务的一大特点。对此,业内人士指出,这与临床心理学的“被绑架”密切相关。

临床心理学缘何“被绑架”?其发展现状如何?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心理学专家。

## 药物治疗遭质疑

提供心理服务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国外,临床心理学工作者既要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又要对重度心理障碍者进行心理治疗。当然,他们必须取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合法执业。

在我国,心理障碍、心理疾病患者在综合医院的就诊率较高。精神科医生是公众解决问题的主要选择,而其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药物治疗。

不过,这一方法已受到广大临床心理学家的诟病。单纯依靠服用药物,而不提供咨询服务,即使控制了临床症状,其心理冲突的发生原因、长期积累环境或心理机制并未解决;在某些特殊情境中(比如创伤后),可能还会加重求助者的心理障碍。

“精神科医生的专长是药物治疗,其依据的专业理论和临床经验显然不能简单地推广到临床心理学情境之中。”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秘书长韩布新说,精神科医生如果未接受系统的临床心理学理论和相应的专业技能培训认证,便将精神科的职业技能想当然地应用于临床心理学服务对象,既违反了职业伦理要求,也会损害求助者的身心健康,更不利于其专业素质的提高。

而且,提供基本的心理咨询服务至少需要 40~50 分钟时间,精神科医生在门诊情境下不可能做到,亦非医院所允许——因为那是心理科的事情。据统计,普通医生对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的识别率低于 30%;而对于已识别的心理问题,总治疗率也很低。

韩布新说,临床心理学家很难参与到心理治疗中去,这实际上是置心理问题高发的严峻现实于不顾。

“一证到手,一辈子管用”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就这样被截然分开,且心理治疗被限定在医疗机构中。

2013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对这一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临床心理学的发展,《精神卫生法》更多的是偏向于负面控制,即告诉各类临床心理学从业人员“你不能做什么”。

韩布新说,《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际上是给了精神科医生更大的特权,但没有对其从事心理治疗工作时必须具备的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执业资格等提出要求。

在他看来,以医疗机构、心理治疗执业行为的限定代替对于从业者个人临床心理学专业素质的要求,是未本倒置,也是《精神卫生法》存在的最大误区。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误导,不利于精神疾病和临床心理学两个行业从业人员的自身定位与职业发展。

有需求,有市场,必定催生心理咨询这一新兴职业。心理咨询师队伍的迅速壮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证到手,一辈子管用。”这是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武国斌对心理咨询师职业现状的概括。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所有的临床心理学家一定要有博士学位,本科之后要经过长达 5 年的专业训练。而在中国,据专家表示,只要背了指定的几本书,就可以拿到心理咨询师的证书。整个心理咨询业处于低端水平,对心理问题诊断的精确性不言而喻。

“当求助者找到你,你能否真正帮人解决问题,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武国斌说,目前国家

职业鉴定部门只负责颁发资格证书,心理咨询师持证后缺乏执业监管等,是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重要原因。

## 建立无缝连接平台

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的截然分开,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普通的心理障碍被当作疾病给予药物治疗;二是严重的心理疾病没有被识别。于是,求助者因得不到有效的诊断而成为受害者。

去年的首都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林春说,如果当时社区能定期进行心理排查,把有问题的人记入档案,并提供相应的心理服务,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与国外的叶茂枝繁相比,中国的临床心理学才刚刚起步。为了提高持证心理咨询师的从业水平,武国斌认为,应尽快建立一套规范化的遴选和淘汰机制,实行注册管理,通过继续教育、定期考核等措施,使拿到证书的人看清努力方向,跟上职业化进程,尽快成长起来。同时,将不适合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淘汰出局。

韩布新也认为,一方面要建设一个国家认可的管理平台,负责向大众公布相关机构、人员的联系信息;另一方面,中国心理学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共同努力建设有资质认证的专业服务队伍;同时,执业场所需要根据国情重新细化。“这三者需要实现无缝对接,并对公众开放。”

# 科学家用全新方法发现大量环形RNA分子

本报讯(记者黄辛)9月18日,《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杨力课题组和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陈玲课题组完成,他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实验和计算方法,并利用它发现了体内大量存在的环形RNA分子。

《细胞》杂志的评审专家表示,该研究对哺乳动物细胞系中环形RNA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全新解读。

据了解,科研人员利用特殊核酸酶对环形RNA的富集,采用全新的计算分析流程,在人源胚胎干细胞H9中发现了近万条环形RNA,并首次证明了内含子RNA互补序列介导的外显子环化(环形RNA形成)。该研究还发现,不同区域间互补序列的竞争性配对,可以选择性地产生线性RNA或是环形RNA。同时,在人类基因组内含子区域中蕴藏着大量的

互补序列,这些互补序列的选择配对及其动态调控使得同一个基因可以产生多个环形RNA,这种现象被称为可变环化。这一系列发现为深入研究外显子环化、可变环化以及剪接的调控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没想到只有两年多,就发现了2万多个环形RNA分子。”陈玲玲介绍说,这类分子对生命意义重大,目前的发现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与它们相关的基因中,至少有10%与疾病相关”。

杨力则表示:“目前,科学家对环形RNA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未来它必定会为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相关专家表示,该研究首次阐明了互补序列对外显子来源环形RNA产生的调节机制,并进一步揭示了互补序列竞争性配对介导的可变环化调控,以全新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基因表达在转录/转录后水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国际能源经济学会第四届亚洲大会召开

本报讯(见习记者倪思洁)9月19日,国际能源经济学会(IAEE)第四届亚洲大会在京召开。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何鸣鸿等出席大会。

李静海说,经济转型和能源革命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发挥关键作用,也需要加强对能源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认识,探索建立驱动能源经济系统向高效、低碳、清洁、可持续方向发展的有效机制,设计公平合理的政策体系和国际合作框架。

何鸣鸿表示,能源经济和能源政策研究在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挑战的事业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基金委重点支持的领域。

会议由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共同主办,这也是IAEE系列国际学术会议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中科院政策所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范英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 中科院东北分子育种基地成立

本报讯(记者张好成)中科院“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先导专项东北分子育种基地日前在哈尔滨揭牌成立。中科院副院长何建坤、黑龙江省副省长胡亚枫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

据悉,该育种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以水稻为主,大豆、玉米为辅,解析这些重要农作物的复杂性状分子调控网络,阐明其互作效应,获得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分子模块和主效分子模块系统,并建立模块耦合组装的理论模型,实现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模块的有效组装,创建新一代超级品种培育的系统解决方案和育种新技术,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核心战略支撑。

据了解,近年来中科院通过系统布局,在以水稻为代表的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特别是水稻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组研究,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为实现水稻的生物育种奠定了重要基础。

#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纪念会举行

本报讯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中国核学会日前在京举行“第二届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高层论坛暨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座谈会”。20余位院士以及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贡献的老专家等出席座谈会。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科协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为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做了大量工作。科技强国贵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应当成为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李冠兴表示,中国核学会聚集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于敏等大批“两弹一星”元勋和知名专家院士,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极其重要。(潘锋 秦子淇)

## 科学时评

主持:张林影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 大学举办家长会无可厚非

孙兆扬

曾被视为中小学和幼儿园“专利”的家长会,如今正在被众多高校“移植”到大学校园中,其中不乏许多著名大学。有媒体日前报道称,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北大等高校,最近在新生报到之际纷纷召开家长会。此事引发广泛关注,甚至有专家认为,大学举办家长会表明大学的管理正在向低龄化、保姆化发展,令人担忧。

不过,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似乎有点杞人忧天。纵观五花八门的大学家长会,既有对学校发展历史、学科优势的介绍,也有对校园文化、办学特色的宣传,还有关于职业规划、心理情感方面的咨询等。大学家长会绝非对中小学家长会的简单抄袭和模仿翻版,而是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升级加强版”。

其实,大学家长会在许多高校已存在多年,比如北京大学的新生家长会就已经举行了十多年。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但效果得到了高校管理者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认可,因为家长会不仅成为大学与家长进行沟通的渠道之一,也成为通过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于此看来,与其指责大学家长会可能导致大学管理走向“保姆化”,不如说“升级版”的大学家长会对传统惯性思维认知下家长会的扬弃,更是一种在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下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在欧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大学家长会也普遍存在。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大学教育文化十分注重学生家长的参与,家长在子女的大学生活中要参加三次重要的美式家长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家长会的举行仅仅是让学生家长误读为需要代替学生作出决断,是有害而无益的,毕竟“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而非越俎代庖的随意包办。大学是自主精神培育和独立人格养成之所,只有培养造就出具有自主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学生,才能将大学精神发扬光大,影响并引领社会发展。

因此,大学是否应举办家长会不应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开好大学家长会、如何发挥其有益效用,才是社会尤其是高校教育管理者应当深思的关键问题。

当下,高等教育正处在由量到质的转型发展阶段,同时也暴露出大学在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学生教育管理人员不足,无法真正做到教育管理的精益化。大学举办家长会,既是对大学教育管理存在问题的回应,也是弥补大学教育管理中家长缺位的重要手段。通过类似家长会的方式,多方携手联动共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尝试。这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包容,更需要引起高校管理者的认真思考,把大学家长会开好。(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9月21日,山东青岛贝壳博物馆内,两位小朋友在观看贝壳。

当天是山东青岛科普周的第二天,青岛市民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带领孩子来到科技馆,学习科学知识。据了解,9月20日至26日全国科普日暨青岛科普周期间,中国海权教育馆、青岛滨海学院自然博物馆、青岛贝壳博物馆等青岛34家科普教育基地免费向公众开放。CFP供图

中科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谈“率先行动”计划:

# 在新的历史时期调整好定位

■本报记者 彭科峰

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中科院不久前正式启动“率先行动”计划,新一轮改革大幕拉开。分类改革、资源整合、新评价机制等问题,都是“率先行动”计划实施中的热点和难点。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日前对中科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进行了专访。

## 不同历史时期应有不同定位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强调中科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一年后,中科院“四个率先”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尽管具体细则仍待完善,但改革的大方向已定,一场前所未有的浪潮正席卷而来。

在“率先行动”计划中,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的分类改革被外界视为核心部分。按照计划,各研究所要分步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创新研究院、特色研究所四类。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创新工程”,两次改革对研究所何不同

意义?

穆荣平认为,两次改革的背景不一样。1998年,中科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时,所面临的问题是经费不足、科研条件落后、人才队伍不稳等。之后,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大幅增加,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的条件也得以改善。随即,教育部启动“985”计划。如今,国家经济总量和研发投入经费投入大幅增长,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我认为,科技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嵌入到经济发展中去。科技界、科研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也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定位”。

他举例说,中科院在启动“知识创新工程”时,就已经有过建立创新基地的设想,但因当时产业创新水平相对落后,企业对高科技的有效需求不足。随着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崛起,科技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已深入人心。因此,中科院适时启动创新研究院计划,就是要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支撑企业实现创新发展。

## “率先行动”计划需要在实践中完善

对于中科院此次启动的“率先行动”计划,

研究所普遍表示欢迎和支持,但对研究所的定位、四类机构的优劣等仍存在一些疑虑。

对此,穆荣平认为,白春礼院长也强调研究所分类改革“不搞一刀切”,“这四类机构定位各有侧重,同类机构也各有特点。因此,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分类改革政策。对研究所来说,率先推进改革是抓住重大发展机遇的正确选择”。

穆荣平还提到,在四类机构中,比较有难度的是创新研究院的建设,而在卓越创新中心和大科学中心这两个方面,中科院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特色研究所也比较好理解。“当然,创新研究院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他举例说,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研究院善于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整合一流的创新要素,成效很好”。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自主开发技术和系统开发方面有特色,“它们是根据自己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的预判,结合自身优势,组织科技攻关成功,再请用户来挑选”。

穆荣平认为,这两个研究所的经验都值得总结和借鉴,在“率先行动”计划中,各个研究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找准定位。

## 国家须重视科学咨询工作

穆荣平长期从事科技和创新政策研究,参与了国家许多重要规划和创新政策研究的起草。他认为,国家需要进一步重视科学咨询工作。科学家在事关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研究起草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参与的机会仍不够充分。

此次中科院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中,明确组建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这是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的战略举措。穆荣平认为,智库建设的关键是“有效整合院内外相关研究资源,强化智库的科研、咨询和教育三个功能的一体化建设”。同时,构建全球化的科技智库研究网络,必须充分发挥院士群体的科学思想优势和政策研究专家把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解决方案的综合集成优势。

“过去几十年,我国对于科学咨询工作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很多方面没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咨询作用。比如生态环境建设、重大工程等方面,政府应加强科学咨询工作。”穆荣平表示。

他同时强调:“应该说,改革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改革是一种常态。在‘率先行动’计划中,各个研究所需要不断对照标准,不断调整,实现科技和经济的完美结合。”